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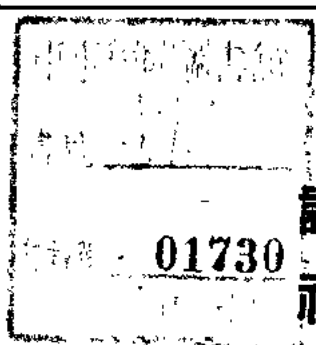
論社會發展學說史

中外出版社印行





2 035 8971 3



論社會發展學說史

梁亞歷山大洛夫著
香譯

中外出版社



論社會發展學說史

著者 G·亞力山大洛夫

譯者 梁香

出版者 上海時代社

發行者 中外出版社

北平西長安街
電話(三)〇六七九

總經售處 知識書店

天津羅斯福路

益智書局

唐山永安路

一九四八年五月上海二版

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一版

目次

一	社會學說史的對象·····	六
二	關於過去的社會發展理論的幾個特徵·····	一一
三	觀念論社會學說史著作的基本缺點·····	三二
四	社會發展理論史和歷史唯物論·····	四〇

社會科學有着一段悠久的歷史。在社會知識的歷史中，對於社會生活現象的理論上的研究和綜結，蘊藏着很豐富的經驗。列寧和史大林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時，總要注意到社會發展理論的歷史，他們一面既指出過去的學說的肯定成分，同時一面也指出其歷史的局限性、單方面性和錯誤性。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典範作家，列寧，和史大林，在他們自己的勞作中，以發展了的形式來敘述馬克思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學說所抱的態度，他們揭穿歷史觀念論之無能，同時對於過去和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學的主要流派作了全面的科學的批判。大家知道，譬如，列寧在他的『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們怎樣對社會民主黨人作戰？』一書中批判了社會學中的主觀觀念論的方法和所謂有機學派；在『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和斯特魯威先生書中對它的批判』以及『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勞作中，批判了反動的資產階級觀念論社會學中的新康德主義和馬赫主義的學派；列寧在他自己的許多勞作中暴露了馬爾薩斯主義、所謂『社會的達爾文主義』、以及孟什維克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社會學教條。大家也知道，史大林在他的『無政府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一著作中毀滅地批判了無政府主義者和孟什維克對於社會發展問題的反科學的反動思想。在『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中，史大林批判了資產階級和孟什維克對於民族——這一個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問題——的起源、本質和發展等的見解。在發表於『列寧主義問題』一書裏的一些勞作中，史大林揭穿了第二國際資產階級孟什維克主義教條之完全無能與反動性

，並且在社會和國家的發展的問題方面向托洛斯基主義和布哈林主義的思想施行致命的打擊，激澈底地粉碎了反動的「平衡論」，根本暴露了憎恨人類的法西斯主義的人種論的社會發展「理論」。在著名的「關於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文中，史大林對於社會發展學說中流傳頗廣的各種傾向——地理論以及那認為社會發展是依賴於人口的生長與密度的學說——作了全面的批判的說明。

布爾什維克黨的奠基者和領袖，列寧和史大林，一向很注意於研究和批判社會學中馬克思以前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流派之重要性。假使想深入地研究馬列主義的學說，就應該以社會科學史的知識來豐富自己的頭腦，而且應該對非科學的觀念論的社會發展理論抱批判的態度。

大家知道，社會思想史上，曾經有過不少次想說明社會生活及其各方面的發展的企圖。例如，亞里斯多德（384—322, B. C.）曾詳盡地描寫過希臘各城邦的國家機構；盧克萊西·卡爾（365—55, B. C.）曾約略描繪過人類社會進化的圖畫和指出過勞動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霍布斯（1588—1679），斯賓諾莎（1632—1677），盧騷（1712—1778）曾和以社會約法的理論來闡釋人類共同生活和國家起源的基礎；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狄德羅，荷蘭巴赫，愛爾維西，德尙），曾發表過關於外界環境對人的道德、行為和意識的影響的深刻見解；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傅利葉，聖一西門，奧文，曾因透澈地批判資產階級社會而對於社會科

學有過很多的貢獻，並且曾經嘗試擬製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計劃。對於社會科學的發展特別有成績的是下列各位俄羅斯的革命的啓蒙運動者和唯物論者的活動：白林斯基，赫爾岑，契爾納雪夫斯基，陀勃洛留波夫。在他們各自的著作中，他們曾經向農奴制度和資本主義剝削作過毀滅性的批判，密切地走近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概念，對於人類生活中的物質方面賦予了重大的意義，他們嘗試樹立社會進步勢力勝利的歷史的必然性的基礎，預言沒有人壓迫人和人剝削人的比較公正的社會制度之必然來臨。

雖然這一切以及諸如此類的見解，還不是對於社會生活的真正科學的意見，然而這些意見乃是科學的歷史唯物論的準備。

一 社會學說史的對象

蘇聯和其他各國國內一切社會階層對於政治生活的普遍的熱烈的興趣，在最近幾年中產生了一種廣大的趨勢，就是竭力想認識社會與國家的活動力量和發展法則。因此也增長了研究社會科學史的興趣。在這種情形之下，結果總是如此：因需要而產生建議。近幾年來，英美法及他各國出版了大量的回憶錄、歷史研究和企圖從社會學的見地來分析過去的社會生活和社會學說史的著作。看了已出各書的內容，可以知道科學者和政治家們之所以執筆寫作，決不是爲了一種什

◎ 我們這裡只舉出英美法各國最近出版的關於上述問題的幾部著作：

J·貝納爾：『科學的社會機能』，紐約，一九三九年；

哈萊維：『英吉利民族史』，卷五，巴黎；

拉伊特：『美國經濟史』，紐約，一九四一年；

O·裴德與M·裴德：『美國文化的發展』，紐約；

D·特萊威里揚：『英國社會史』，倫敦，一九四四年；

B·法林頓：『古代的科學和政治』，紐約，一九四〇年。

鮑加代斯：『社會心理學基礎』，紐約，一九四二年，第三版；

S·佛里特：『社會心理學新思潮』，紐約，一九四〇年；

麼抽象的願望；他們有的是從現在注意到過去，想以之來了解他們自己的政黨和他們自己的階級之所以失敗的歷史因緣，有的是想從過去汲取補充的知識和力量，以便現在爲了進步的目的而順利地進行鬥爭。

從近年來社會科學發展的經驗中，可以得出結論，現在研究社會生活的歷史和社會生活的知識的人所關心的，不單單是過去現象的描寫，不純粹是歷史事變過程的經驗的觀察；他們現在所關心的是歷史發展的另一方面。早在三四十年以前，國外關於社會的研究，就已經爲所謂新康德主義學派所支配，這一派的人物公開地或者含羞地否認有社會發展法則的存在和因此而承認有

集體著作：『現代社會理論』，紐約—倫敦，一九四〇年；

鮑加代斯：『社會思想發展』，紐約，一九四〇年；

L. 伯納：『美國社會學的根源』，紐約，一九四三年；

桑塔格：『德國哲學中的利己主義』，第二版，一九三九年；

B. 杜爾納：『偉大的文化傳統』，卷一，卷二，紐約，一九四一年；

M. 波斯坦：『社會科學中的歷史方法』，劍橋，一九三九年；

J. 斯普爾：『創的世紀。歷史發展的研究』，倫敦，一九四四年；

J. 湯姆遜：『歷史學史』卷一，卷二，紐約，一九四二年；

F. 赫爾茨：『歷史與政治中的民族性』，倫敦，一九四四年；

V. 勃雷斯福：『歷史社會學』，紐約，一九四三年；

G. 葛雷：『社會與意識形態』，紐約，一九四三年；

L. 斯杜爾卓：『社會的內在法則』，紐約，一九四四年。

認識這種法則的可能性。現在這種觀點顯然已經失去了基礎。現在歷史家們並不企圖描寫歷史和社會理論的現象，而是企圖深入到這些現象的意義中去，發現事變的某些順序，確定事變之間的必然的聯繫。這種願望他們能實現到什麼程度，那完全是另一個問題，但是不能否認有這種願望存在。何況現在非但是研究家，而且每一個現代人，都親眼看見有些事變把新康德主義者的觀念推翻得乾乾淨淨了，所以怎麼能否認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呢？無論那一個有系統地觀察國際生活的人，都可以看見，譬如說，假使人民，整頓他們國事方面不遇到阻礙和不像希臘那樣有依靠外力組織武裝黨徒以鎮壓人民自由表現意志，——這種地方的人民是選擇民主的生活形式的。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亞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情形就是這樣。每一個忠實和進步的學者以及真正擁護民主的人，都應該承認，這種事變的過程是帶有合法則性的。現在祇有那些根本或明或暗地反民主的敵人，擁護反動勢力的專橫和恐怖獨裁的人，才會否認這些國家內民主勝利的合法則性的。現代社會的發展，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了社會現象的合法則性的發展，證實了現象內部的必然的邏輯和相互關係。

所以，在我們的時代，生活的客觀的發展過程，推動着那不存偏見的社會活動家和學者去承認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

然而從承認社會生活的合法則性到發現和正確地說明社會發展法則，這兩者之間的距離是非

常遙遠的。經驗指示，祇有能大無畏地從承認社會生活的合法則性發展的事實出發來作一切結論的人，祇有不存虛偽的偏見來研究歷史過程的人，才能正確地理解社會發展的法則。

精通社會發展科學的重要工具乃是研究關於社會發展的理論和學說的歷史。社會發展理論，歷史指示，歷史唯物論是唯一可靠的社會發展學說。社會科學的歷史，可以幫助更深入地精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歷史唯物論。

人類發展和社會思想發展的歷史佔據着好幾種科學：通史，政治學說史，社會發展理論史，哲學、國家與法理史，文化史，還有其他的科學。社會學說史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社會理論的創立者們都會經企圖深入到社會現象和社會交替的合法則性之中去，企圖辯認人、民族和國家的關係的基礎。

社會發展理論史在某種程度上是和政治學說史相符合的。但不過是在某種程度上而已。這兩種科學中所討論的都是人對於社會的見解的歷史。然而假使說，政治思想史中所討論的是對於社會政治機構的見解，那末社會發展理論史中所討論的是關於各民族發展法則的學說的歷史。政治學說史家所敘述的主要是社會知識史中的一面，就是社會政治機構學說發展史，同時社會理論史家所經常處理的是整個社會過程的學說，是想說明社會發展的過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相互關係。所以，社會理論史是研究社會科學之歷史的形成過程，是研究對於人類社會的發生、構造及

其發展法則的見解的。

然而上面所說的，並非表示社會學說史似乎是與各時代社會生活的具體的歷史條件無關的。在關於社會生活的理論概念中，或者或多或少有點正確或者是歪曲地描寫社會中實際所形成的人的關係的。批評一個時代必須要看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但是，因為過去的理論構造中無論怎樣總是反映着社會中所存在的人的關係的，所以社會發展的研究，對於理解各該時代社會生活的特徵，也有着不小的意義。亞里斯多德的奴隸理論或者，譬如說，十八世紀的進步的法國思想家們關於自由、平等、博愛的學說，前者如果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度，後者如果沒有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關係的發展，都是不可能產生的。不論是古希臘的奴隸制度，或者是法國革命，都祇有研究了當時人們物質生活的條件之後才能從新的方面作更深入的發現。但是，假使歷史家在描寫的時候能顧到譬如說柏拉圖在『理想國』和『論法理』中以及亞里斯多得在『論政治』和『論雅典政治』中所表現的見解，古希臘的社會生活是可以被理解的。同樣的情形，比較能理解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的是那些能注意盧騷的『懺悔錄』、瑪恩·梅里愛的『遺言』、荷蘭巴赫的『自然的體系』和法國啓蒙運動者們的『百科全書』的人。

任何科學的歷史是揭露各該科學的形成過程的，與此同樣，社會科學的歷史中所表現的是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的準備過程。

二 關於過去的社會發展理論的幾個特徵

社會學說的歷史包括着非常龐大的時期——從古代到我們的時代，——它對人類智力發展的理解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材料。但是同別的幾個部門的社會科學比起來，社會科學史中所包含的科學的發現是比較少。在過去的社會發展理論中，沒有一種理論會對歷史過程的發展法則作過嚴格的科學的說明。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一切關於社會和國家的學說，都對社會生活作了觀念論的解釋。這些學說結果把社會的發展看做是依賴觀念、思想、道德或者是依賴神的。有時候這種解釋很是獨特和大膽，然而在用發點的立場方面和在解釋社會發展的原則方面總是錯誤的。這所說的不僅是那些擁護觀念論哲學的社會學家和哲學家，而且也是那些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來解釋自然界的思想家。

和一切觀念論的社會學不同，馬克思主義是將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作為解釋社會發展的基礎的。

從觀念論出發解釋社會生活的理論存在了已經有二千多年。歷史唯物論不過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才產生的。然而，假使對社會科學史抱客觀的態度，假使祇從那些由歷史科學所完全確定的

事實出發，就不會不看見，在過去一百年中，馬列主義社會科學所發現的比了以前的全部社會科學史所發現的要多，而且完全是科學的。

社會史之唯物論的解釋，是社會發展法則的徹底科學的解釋。歷史唯物論並且科學地說明了社會和國家學說的出現的原因和條件以及在過去和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意義。

在全部社會學說史中——從柏拉圖到黑格爾和從後者一直到現代各國研究家們論到社會科學問題的意見——可以追究出一條和所有這一切傾向有着血緣關係的線。許許多多派系的社會學說的一切代表，都想深入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本質中去，他們在解釋人們的生活和社會的發展的時候，或者引用一種超然於社會之上的超自然的力量，或者引用人們各方面精神生活中的一面，或者引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不是基本的一面，然後加以抽象化。柏拉圖在善的觀念的存在中看見了人的生命力的意義；亞里斯多德竭力想在社會向前跨進的每一步中發現某種目的的體現；康柏納拉（一五六八——一六三九，意大利哲學家）將人性和人所創造的神的形象相比擬，他在人們企圖實現理想的社會機構的渴望中看見了社會發展的意義；孟德斯鳩（一六八九——一七五五）說教地指出國家法律的全能的壓倒的力量；傅利葉終其一生在期許善良的富人或者統治者出現，希望他們將資本或者政權轉注於社會改造；法國的啓蒙運動者和唯物論者認為社會生活的基礎是人們的教育、道德和社會輿論；在黑格爾的哲學中，認為控制全部歷史的是那竭力想名喚實生活的發展

來趨向於自覺的世界精神；甚至於唯物論哲學家費爾巴赫也認為現實歷史的時代是可能依照宗教史中的相當的時代來區分的。所以，社會理論的創立者們取作解釋社會關係的出發點的是人的精神活動的某一面。在這種情形之下，重要的不是社會問題研究者取作爲基礎的是這種精神生活的那一面，——是道德和風俗，是科學的狀況，是人類髮奮努力所趨的外來的強加在社會身上的目的，是那受千百萬新陳代謝的世代所管制的世界精神，是社會輿論，還是法制權的全能的力量。當然，如果看不見這一切解釋社會生活和歷史過程發展的理論之繁複的花樣和重要的區別，那才是可怪了。這些理論之間的區別毫無疑問是有的，而且有時還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但是所有這一切仍舊是人類社會的構造和交替之觀念論的解釋。很明顯，這樣解釋社會發展的時候，就完全抹殺了人民大眾在歷史中的作用。列寧揭露了以前的社會發展學說的這種缺點。觀念論的社會發展學說「恰巧沒有將人民大眾的行動包括在內，而歷史唯物論則第一次使得可能以自然的歷史的正確性來研究羣衆生活的社會條件和這種條件的變化」（『列寧文集』，卷十八，頁十三）視野中失去了人民大眾的活動的社會發展理論，是不能被稱爲社會科學的。這種理論抹殺了歷史過程的創造者本身——勞動大眾。史大林指出，歷史唯物論提出了世界歷史的真實基礎——人民大眾的生產活動——來代替以前的觀念論的思想。史大林寫道：

『這意思就是說，社會發展史，首先就是生產發展史，就是千百年來新陳代謝的生產方法史

，就是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的發展史。

『由此可見，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的歷史，就是勞動羣衆的歷史，因為勞動羣衆是生產過程的基本力量，他們實現着社會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生產。』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如果想成爲真正的科學，就不能再把社會發展的歷史歸結到帝王和將相們的行動上去，不能歸結到國家的「侵略者」和「征服者」們的行動上去，而應該首先要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歷史，勞動羣衆的歷史，各民族的歷史。』

『由此可見，研究歷史發展法則的關鍵，不應該在人們的頭腦中，不應該在社會的觀點和觀念中去找尋，而應該在各特定的歷史時期中社會所採用的生產方法中，——在社會的經濟中去找尋。』（史大林，『關於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

社會生活的非科學的觀念論的解釋，非但是那些提取人類精神發展的任何一面作爲決定因素的社會生活理論的創造者們所特有的。還有那些不取目的、善性、世界精神或社會輿論而取像地理環境、人口等等爲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的人，也同樣應該列入解釋社會構造和發展之非科學的觀念論的陣營中去。

我們且舉兩個例子：

例如，如果否認地理條件在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那是完全不合理的。地理條